

中共留學政策與留學人員的評析

劉勝驥

六年前中共開始派遣學生到美國、日本、西歐留學。當時，我中華民國在這些地區的留學生應如何與中國大陸留學生相處，一度是國內廣泛討論的話題。國人莫不希望透過海峽兩岸留學生的交往，來影響中國大陸自由民主的發展。

幾年過去了。以美國為例，海峽兩岸留學生的關係却未必盡如預期。在量的方面，中共留學生和訪問學者人數激增，在若干名校甚至已和我們留學生人數相埒，因而分庭抗禮，不再需要我們留學生在生活上的指引照顧了；在質的方面，中共使館始終未放棄對其留學生的組織與掌握，更何況相當比率中共留學生本身就是中共黨團員或共幹子弟，遂致海峽兩岸留學生在許多校園都發生過對抗事件。因此，我們對中國大陸留學人員，不能抱著好奇、關懷、友愛、協助、影響與說服的一廂情願的態度，實有必要重新了解對方，並據以調整彼此的關係。

一、中共新留學政策

中共早期的領導份子不乏留法、留俄、留德、留日的留學生，而共產主義和共產黨又是自外移殖的產物。所以，中共雖然經歷毛澤東「文革」十年的鎖國政策，它重新開放門戶並大量派員出國留學是一直有可能的。

一九七八年鄧小平復出，這位前留法學生主張向西方學習科技以加速現代化的建設，大量的留學生也在這年下半年開始派出了。據了解，中共「中國科學院」正副院長七人中，有六人是拿外國學位的，該院設在北平的三十九個研究所的二百零五名正副

所長，有六十一人是來自海外的知識份子，佔百分之三十。美國回去的錢學森、法國回去的錢三強，分別對中共發展飛彈、核子武器，起了重要的作用。這些受西方教育的科技專家在「文革」時不被信任，但「四人幫」倒臺不久，鄧小平就起而為有一「海外關係」的人做平反，他說：「說什麼『海外關係』複雜，不信任，這種說法是反動的。我們現在不是關係太多而是太少，這是個好東西，可以打開各方面的關係。」^①

海外關係如何好？又可以打開那些方面的關係呢？估計我旅美教授、科學家、工程師（含華僑、華裔）約有三萬人。美國電腦工業的重鎮加州矽谷地區有一千多華人、華僑研究員，其中擔任電腦研究部門主管者有十二人。前年在舊金山召開的國際材料科學大會上，提論文和爭相發言的代表泰半是黃皮膚者，日本人和代表美國的中國人在會場上出盡風頭。柏克萊加州大學電機和電腦的教授名單，一半是張、王、劉等中國姓氏。在加拿大、英國、法國等地華人、華僑中，也有許多科技專業人才。這顯然是股非常重要的力量。中共急於從事現代化建設，一定採取各種措施吸引海外科技人才。

大陸淪陷前後回去的海外科技人才多已年紀老化，現回去的旅美學人畢竟不夠踴躍。所以，中共派遣學生赴外留學、派遣學者赴外進修，以期在根本上培養自己需要的人才。中共「教育部」和「國務院科技幹部局」宣布：

第一、「派出留學人員不僅是現階段為解決四化急需的高級科技和管理人才、加快縮短與世界先進水平差距的一項重要措施，也是今後必須長期堅持的一項方針。」

第二、「今後選派留學人員的方針是：在確實保證質量的前提下，根據國家的需要和可能，要廣開渠道，力爭多派；」

第三、「在選派工作中，必須堅持三個為主的原則。即：選派留學人員應以培養高等教育師資為主……派出專業應以自然科學為主……自然科學方面應以技術科學為主，但也不應忽視基礎科學和應用技術的需要。」

第四、對留學人選則提出「以進修人員和研究生為主，同時派出一定數量的大學本科生；將來逐步做到以派出研究生為主。」「要把那些擁護黨的路線、熱愛祖國、有革命事業心和幹勁、真正願意為實現四化攻關獻身、思想品質好、身體健康、有一定外語基礎、業務基礎好、擁有培養前途的優秀人才選送出國留學。」^②

中共留學政策是其從事四個現代化的配合措施，為解決高級科技人才和管理人才的缺乏，加速縮短中共與世界先進水準的差距，中共自一九七八年起派遣大量的留學人員出國深造。當時「教育部長」劉西堯擔心留學生滯留不歸，鄧小平就說：「即使派出去的留學生有一半不回來，還有一半回來可以搞四化建設，也比不派、少派要好得多嘛！不要再老談『算政治帳』一套了。你

註① 程驥「海外關係是個好東西」，香港《爭鳴》（一九八三年九月）第七十一期，第二十一—二十二頁。

註② 「教育部」宣布「進一步明確自費出國留學政策界限」，見《人民日報》一九八〇年十一月十日，第四頁。

怕負不了責，就不要幹。我負責」^③。因此，中共新留學政策遂告定型，一九七八年中共中央通過了大規模向海外派遣留學生的決議案。一九八〇年中共中央除了再次強調「保證質量、力爭多派」的方針，又決定大開自費留學之門^④。

西方國家對於中共派遣留學生的構想，無不熱誠予以接納。其基本構想是拉開鐵幕、推動和解，以民主自由思潮來啓迪中國大陸人民的觀念，教育未來的中共領袖成爲親西方者。至於門戶大開，造成科技情報的外流和增加保防工作的負擔，看在和解政策以及可觀學費、生活費的外匯收入，也只能不予計較了。

美國大學入學申請，必須有托福（TOEFL）成績；研究所入學申請，例必有GRE成績。由於美方熱誠推動學術交流計劃，乃儘量予中共學生通融。美方在中國大陸講學的教授曾負甄選之責，史丹福大學的歷史系范力沛（Van Slyar）在下場的北京飯店，面試中國大陸學生的英語會話能力。柏克萊數學系陳省身教授在其赴平講學的系裏，親自批准了兩名中國大陸生的獎學金。第一次托福測驗舉行於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十一日，北平、上海、廣州三地共有六百三十名學生參受測驗。十二月十二日則是中國大陸的第一次GRE測驗日子，另有五百五十名中共學生參加^⑤。

目前中共留學生英語能力雖稍遜於臺灣留學生，不過這差距在拉近中。從短期看來，中國大陸上學英語的風氣正濃，英語教科書暢銷，電臺英語教學節目熱門。美國赴中國大陸教英語的人越來越多了，這是由美國國務院推廣的自願計劃（Volunteer in China），解決了中國大陸英語師資缺乏的問題。從長期看來，中共現在自小學四年級起教英文課，將來中國大陸留美學生的英語能力，肯定會逐年提高。

二、中國大陸留學人員的成長

一九七八年中共首度派遣留學生，總數可能不到一千人，而其中留美的可能不到一百名。加州自始以來均是中共派遣留學生的重鎮，當年有十位中共學者赴柏克萊加大研究，柏克萊有二十四名學者和八名研究生赴中國大陸學習中文和社會科學，這是柏克萊加大前校長 Albert Bowker 於一九七八年赴平和「清華大學」、「交通大學」達成學術交流協定的執行。不過，從次年一起，中共派遣交換學者、學生的數目急速成長，超過了美方派往中國大陸的人數。

註③ 「出國留學人員工作會議：研究今後選派重點」，〈人民日報〉，一九八〇年十一月十日，第四頁。

註④ 劉聲「留日學生面面觀」，香港《爭鳴》（一九八四年三月）第七十七期，第三十二—三十五頁。

註⑤ 《民族晚報》，民國七十年十二月七日，引入美聯社北平六日電。

一九七九年中共教育部門派出一千七百多名留學生^⑥，合計兩年來中共「已向世界五大洲四十一個國家派出了各類留學人員二千七百多人，其中教育部系統者派出二千一百多人；中國科學院直接派出六百多人」^⑦。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六日「新華社」電訊：「自一九七八年下半年以來，我國已向四十五個國家派遣了五千一百多名留學人員。其中進修人員三千九百多人；研究生五百六十多人；大學生六百六十多人」^⑧。再過三個月，他們又多派了五百多名留學生^⑨。

一九八二年，中共派赴美、日、法、德、加的留學生，就打破了萬人之數^⑩。一九八三年中，中共「教育部長」何東昌說，自一九七八年以後，中共已派遣了一萬六千名留學人員至國外，並邀請了三千多名外國專家學者到中國大陸的學院授課，另外也接受了八千多名外國學生^⑪。一九八三年度派遣留學人員三千人，總計「已向全世界五大洲的五十個國家先後派出了近一萬八千五百名公費留學人員。已經學成陸續回國的達七千人；目前仍在國外學習的有一萬一千五百人。他們中有大學本科生，有攻讀碩士、博士學位的研究生，更多的則是訪問學者和進修人員」。另外，自費留學生還有七千人^⑫。

表一：中共留學人員的成長

年份	公費生	成長率	自費生	成長率
一九七八	一千人		○	
一九七九	一千七百六十二人	七六%	○	
一九八〇	二千四百多人	三七%	估計一千人	五〇%
一九八一	估計四千人	六六%	估計一千五百人	三三%
一九八二	估計五千人	二五%	估計二千人	三三%
一九八三	三千多人	負四〇%	估計二千五百人	二〇%
總計	一萬八千五百人		七千人	

中共留學人員的成長率雖不穩定，但持續至一九八二年。一九八三年公費留學生呈現負成長，可能原因有二：

第一、中共經濟落後，所能提供留學預算的外匯已到了財政負擔的極限。因此改而提倡

註⑥ 「我國向四十一國派出二千多留學人員」，「人民日報」。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第四頁。

註⑦ 「關於一九七九年國民經濟計劃執行結果的公報」，「人民日報」，一九八〇年四月三十日，第四頁。

註⑧ 「我國不少留學人員取得突出成績」，「工人日報」，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七日，第三頁。

註⑨ 「新華社」消息，「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一九八一年二月十二日廣播。

註⑩ 「我留學人員勤奮學習為國爭光」，「人民日報」，一九八二年四月四日，第三頁。

註⑪ 「美聯社」，一九八三年五月九日北平電，引自次日臺北「大華晚報」。

註⑫ 「我國已有公費近一萬八千五百人、自費七千人赴國外留學」，「人民日報」，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十日，第三頁。

自費留學，歡迎通過在海外親友的資助而申請自費出國者。

第二，政策上縮緊公費留學名額，可能是爲了「防止精神污染」。王炳章、姚月謙等人在海外從事「中國之春」民主運動，也可能對中共高層決策有了某種程度的影響。

在兩萬五千多中共留學人員中，公費生一萬八千五百人，佔總人數的百分之七十一·六，自費生七千人，佔百分之二七·四。這與中華民國的留學生情況截然不同，原因是中國大陸的國民所得極低，有資格申請自費留學者，祇有高幹子弟與主要是閩粵兩省華僑的子弟而已。

三、留學人員的類別和成份

中國大陸出國留學人員，以留學生性質分爲三類：

1. 訪問學者：年齡四十至六十歲，已不適合攻讀學位。他們是中國大陸原有的知識份子、科技人員，現任大學教職或在科研機構研究，其中不少屬於領導階層，例如中共「國際問題」總編輯薛謀洪、「北大」國際政治系主任趙寶煦、「北師大」歷史系系主任張宏毅曾於一九八三年在柏克萊加大訪問研究，中共「中國石油公司」主任工程師陳某曾於一九八三年在史丹福大學訪問研究。中共訪問學者早年曾受良好教育，有的更是海外歸來的留學生，由於中共「文革」長期的「鎖國政策」，更由於「文革」時遭到下放或關進「牛欄」，使其所學與國外新發展脫節。中共爲趕上國外先進科技、提高大學師資水準，因此派遣他們出國訪問、進修。

2. 研究生：一九六五年以前大學畢業者程度比較整齊，中共派遣他們出來，志在攻讀外國學位。王炳章是一九七一年自北京醫學院畢業，但他是在「文革」前最後一批入醫學系的大學生，才有實力在留學加拿大後獲得博士研究生資格。

3. 大學生：爲中國大陸上近幾年的高中畢業生，到國外大學就讀者。許多高幹子弟及僑眷自費留學生，均申請美國、日本的大學部註冊。如劉少奇之女劉婷婷、魯迅之孫周令飛均是。

訪問學者、研究生、大學生三者的人數，根據中共「新華社」資料透露，和美方所做調查，其比率如後：

由上述兩份資料看來，訪問學者仍佔絕大多數，但其所佔比例將不斷降低；研究生比例則日益升高。換言之，待中國大陸留學生人員英語能力逐漸提高後，更多的訪問學者將以研究生名義入學。大學生的比率仍佔少數，且不會有太大變化。不過許多以大學生名義出國者，實際上來美後無法就讀大學，而必需唸英語補校一段時期，這在中共資料中看不出來。

中共留學人員又可以費用來源分爲三類：

表二：中共留學人員的構成

構 成	一九八〇年		一九八二年	
	人 數	百分比	人 數	百分比
訪問學者	三千九百多人	七六·四%	一、九四五人	五六·二%
研 究 生	五百六十多人	一〇·九%	六五六人	一八·八%
大 學 生	六百六十多人	二二·七%	三九九人	一一·五%
補習英語	〇	〇	四六七人	一三·五%
總 計	五千一百多人	一〇〇%	三、四六七人	一〇〇%

備註：一九八〇年資料係取自該年十一月六日「新華社」訊。一九八二年為美國出版之調查報告，該報告向美國三百十三所大學寄出問卷，回收一百八十份，統計一百六十四所大學共有三千四百六十七名中國大陸留學人員。

兩人靠太太的公費很艱苦地生活著。訪問研究的公費只有一年，倘若自行申請到外國供給的獎學金或研究獎助，則可以延長留學期間，否則持J1簽證是必須按期返回中國大陸的。

2. 交換：中共與外國交換學者學生，也是持J1簽證，其本人在原單位的薪資照發，所不同的是其留學費用由留學國家負擔。留學國家付給交換學者學生的待遇，通常超過中共給付留學人員的標準，中共會藉口機票代金等等扣下其超出的數額。例如，美國史丹福大學給研究生的生活津貼為六百美元，則中共要收繳一百五十元。柏克萊加大中國研究中心有個獎助的名額，聘陳若曦時月薪一千元，陳一年期滿受聘為華文報紙的總編輯，加大把此缺保留給中共「社會科學院」國際關係研究所宋副研究員，宋某領一千元，只能留用四百五十元，要上繳五百五十元給中共「舊金山領事館」的學監。

3. 自費：中共和留學國均不給津貼。他們以海外親友的擔保申請自費留學，中共批准他們出境時視同移民，但美方僅發給F1簽證。這些人若是高幹子弟，自費留學還相當闊綽；若是僑眷子弟，則比較肯講真心話，最敢批評中共，且表示不一定回中國大陸。由於經濟的壓力，許多人唸的是學費最廉的兩年制社區大學。有些僑眷表示只做形式上擔保，來美後須自謀生活，以致來美後棄書不讀，打起全天工者亦有之。我在加州遇到一個自費的女共幹，她認識胡耀邦、耿飈等人的兒子，她在洛杉磯和聖荷西

唸英語補校一年，川資耗盡又乏結婚對象，不得不到舊金山中國餐館打全工；廣州「社會科學院」的助理員陳江，獲得密西根大學經濟系的入學許可，自費出國而實際無錢，一來美就屈居柏克萊的中國餐館工作。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旁的湘江餐館，我也曾遇到「上海醫學院」的畢業生。自費生的學生簽證是屬於非移民、不可工作的簽證，他們若被移民局查獲，會遭到遣返的命運。

中共未公佈留學人員的成份背景，惟據「芝加哥論壇報」記者麥納蒂從北平報導，自一九七九年三月起，獲准赴美留學的中共學生中，百分之八十是共幹甚至高幹子女或親戚，留學成了共幹家屬親人的一項特權^⑬。據悉：鄧小平的幼子鄧賀方在紐約羅徹斯特大學攻讀物理碩士，「副總理」薄一波之女薄潔澄在麻省自由派學府布朗代斯大學，「副主席」葉劍英的孫女葉小萍是華府喬治城大學研究生，葉劍英的女婿劉詩昆也在美訪問進修，「國家經濟建設委員會」主任張勁夫之子張安東在馬里蘭大學讀物理，「副主席」陳雲之子和「副總理」方毅之子分別就讀於麻省理工學院和哈佛大學，「政治局委員」宋任窮之女宋彬彬和前「外交部長」黃華之女黃賓賓均就讀於美國哈巴托大學，「中日友好協會副會長」孫平化之孫女孫曉燕就讀於日本早稻田大學。以上只是著名頭目的子女在西方留學的情況，次一級共幹，如「大使」、「參贊」、「省委」、「部長」、「司令」、「政委」等人物，其千方百計送子女出洋者，更不在少數。已故高幹的子女也能托庇祖蔭而留洋，例如前「國家主席」劉少奇次女劉婷婷，就讀波士頓大學，劉少奇幼女劉瀟瀟，就讀西德波恩大學；故「副總理」陳毅之子陳小魯，就讀德州奧斯汀大學。聽說過氣的華國鋒，也準備把兒女送到美國受教育，不知是為自己預留後路，抑或為子女謀前途^⑭？

高幹子弟的大量留學出國，曾引起一般中國大陸青年的抗議，北平發生過示威及貼大字報的活動。一九八〇年留學人員派遣改採「考試」，高幹子弟本以政治理由可獲加分及各種方便，但仍有部分成績實在太差，「踩著梯子也差一截」，減少了高幹子弟的出國機會。

有位史丹福的中國大陸生曾向我表白：他們來美就停止了黨小組活動，訪問學者中黨員比例不高；出國者均經「教育部」考試，業務上過得去，來美均係學術合格人員；留美九千學者學生中，高幹子弟不過一百餘人……我錄存他的表白，以顯示對留美高幹子弟人數的兩種極端的估計。持平的說法要看高幹子弟的定義，倘若以中共「中央委員」或副部長級來界定「高幹」，或許九千人中僅一百人；但若以高幹子弟和平民子弟做對照，則所有留學人員若不是或大或小的學官或科技幹部，就是或大或小的共幹的子弟，因為我旅美一年，很少聽說有工農子弟的中國大陸年輕留學生。

註⑬ 「芝加哥論壇報」記者麥納蒂，於一九八一年七月十日自北平報導，引自七月十二日《中央日報》。

註⑭ 參閱《中央日報》，民國七十年九月二十八日；《香港時報》，民國七十一年七月十六日；船橋洋「中國特權階層構圖」，《七十年代》（香港）一九八三年第八期、第六十六頁。

中共「十二大」召開前夕，中共宣佈自一九八二年四月起，不再派遣高幹（副部長級以上）子弟「自費」出國，已在國外者暫不召回。中共的此一宣佈，一方面是不願其高幹子弟受到外國民主自由思想的感染，一方面是想藉此緩和中國大陸平民反對共幹特權的情緒。然而若連高幹子弟都不准再送出國，人民怎可放心與外國接觸呢？因此這道命令是中共留學政策的改變，一般預料中共將逐漸減少派遣留學人員赴海外^⑮。

四、留學地區分佈與科系分配

中共派往海外各地留學人員，以美國地區最多。據「美國之音」報導，一九八二年中共派赴美國留學人員，共有六千五百人，其中半數係領中共公費。大部分公費生以研讀科學和技術方面課程為主，只有約百分之十五學習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這些人分佈在全美國各地一百六十四所大專院校，尤以在加州、紐約州、威斯康辛州、賓州、麻薩諸塞州的人數較多。「美國之音」指出，中國大陸留學生雖然大部分並沒有與美國社會打成一片，但普遍贊許在美國所受到的教育遠較中共教育為優，特別是能予人獨立思考與靈活運用的機會^⑯。

「紐約時報」在美與中共學術交流兩年後，估計「現在總共約有七千名來自中國大陸的中國人在美國研究物理、工程和其他自然科學。平均約有二百到四百名美國人在中國大陸停留六個月，或更久」^⑰。一九八三年，中共留美人員由六千五百名增加到九千名^⑱。一九八四年，中共駐美「大使」章文晉在費城演講時宣稱：有一萬名中共學生在美國就讀，美國則有二百五十名學者在中國大陸做研究^⑲。

日本是次多接受中共留學生的國家，一九七八、七九兩年，中共派遣二百七十多名留日學生，佔公費留學人員的十分之一。一九八二年，在東京以北約一百公里的築深技術研究中心，它設有包括環境污染研究所的九個研究單位，受訓的外國學員總共有二千八百十二名，其中五百四十一名來自中國大陸^⑳。所以，當年中共留日學生學者應超過一千名。

註⑮ *The Japan Times*, July 16, 1982.

註⑯ 美國之音，一九八二年元月三日播出。

註⑰ *The New York Times*, Aug. 15, 1981.

註⑱ 「中國留美學生學習動奮頗有建樹」，香港《文匯報》，一九八三年九月十八日。

註⑲ 美國聯社，一九八四年一月二十六日費城電。

註⑳ 中央社，民國七十三年一月十四日東京電。

一九八四年中共公費、自費留日學生總數，已達一千六百餘人，其中公費生為一千二百餘人，自費生約四百人。他們大部份分佈於東京、京都、大阪、神戶等地，其中又以東京最為密集，約六百餘人。據統計，日本所接納的中共留學人員，在世界各國中居第三位，僅次於美國、西德；但自費生却佔第二位，其中幹部子弟人數，又幾可與美國平分秋色^②。

表三：留學地區的分佈

國別	派遣人數	百分比	原計劃派遣人數
美國	一萬四千多人	55%+	每年派五千人
西德	二千多人	8%+	每年派五百人
日本	一千六百多人	7%+	每年派五百人
英國	一千多人	4%+	每年五百人
法國	一千多人	4%+	每年五百人
加拿大	五百多人	2%+	未見宣佈
羅馬尼亞	五百多人	2%+	每年五百人
南斯拉夫	五百多人	2%+	每年五百人
蘇聯	十人	0.04%	一九八四年起互派七十人
其他	估計一千人	—	未見宣佈
總計	二萬五千五百人	100%	六年派五萬人

備註：本表引自周白雲先生「中共留學政策的剖析」，載《匪情月報》（民國七十三年

五月）第二十六卷第十一期第四十九頁。

的中共留學生和訪問學者研習語言、人文、社會、法政、財經的十不足一，相信若不是美方在這些科系還提供了相當名額的交換

中共留學生多派往美國、西德、日本等科技先進國

家，這是其留學政策以吸受科學技術為主的自然結果。中共想探勘和提煉更多的石油，就派遣化學、石化、地質科系學生赴美；中共想發展尖端科技，就派遣電機、電子、自動控制學生分赴美國、日本；中共想培訓大學師資，就派遣數學、物理、核能、光學學生去美國、西德；中共擔心大地震，就向設有地震研究所的柏克萊加大和史丹福大學派遣學者。交換名額用完，就大量派遣公費人員。

由於中共留學人員偏重研習自然科學和技術，結果柏克萊的一百七十名中共學生中，讀政治、經濟、法律等系的加起來還不到十五人，而且還包括專攻中共所極感迫切需要的商事法和海洋法學者。史丹福大學一百名中共學生中，我只聽說一人唸經濟、一人唸新聞而已。哥倫比亞大學不唸自然科學的中共訪問學者，有六人在唸國際貿易、旅遊等。舊金山加州大學也有十位中共學者在交換計劃下研究醫學教育^②。

鄧小平曾說：「美國的政治學不必學。」因此在美

註② 劉聲「留日學生面面觀」，香港《爭鳴》（一九八四年三月）第七十七期，第三十四頁。
註③ *Asian Week* (San Francisco), August 18, 19, 1983, p. 12.

計劃，則這些非科技的系列可能根本不會有中共留學生。

表四：留學科系的分配

所學科系	人數	百分比	備註
理工	四千六百多人	九〇・四%	本文資料引自一九八〇年十一月六日「新華社」訊。「其他」一欄包括人文、社會、經濟、管理、法政等。
語言	三百八十多人	七・四%	
其他	一百十幾人	二・二%	
總計	五千一百多人	一〇〇%	

中共留學人數激增，改變了彼此人數比例。一九七九年中共赴美學生僅一千人，約為我留美學生的十七分之一。一九八二年中共留美人員共有六千五百人，為我留美學生的三分之一。一九八四年章文晉宣稱他們有一萬人留美，為我留美學生的二分之一。這個比數還在繼續拉近中。中共留學生勢力逐漸增長之後，其校園活動能力也漸增強。

過去雙方不想強調的政治因素，遂在中共留學生在大學校園勢力日增後爆發出來。今（一九八四）年一月底，為配合中國舊曆新年的來到，許多學校都有「中國週」的舉辦。在耶魯大學雙方講好都不懸掛國旗，臨時中共却拿出偽旗來，我方同學當然也出示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中共學生提嚴重抗議，幸校方國際學生中心（IC）裁定我們也有懸國旗權利始息爭。伊利諾理工學院此時以「中國週」作為其舉辦有年的「國際文化節」展開序幕。主辦權是由我中華民國同學會負責，中共留學生和訪問學者乃向校方抗議，聲稱他們才代表中國，此類活動應由他們主辦。由於我同學會在校表現甚佳，故而我仍然保持主辦權，但偽旗却許與國旗同在「中國週」會場上一齊掛出來。

一九八二、八三年筆者訪問美國三校時，攻擊我們最激烈的團體，尚不是中共，而是臺獨。在史丹福大學，臺獨再三攻擊「中華民國派遣校園諜刺探臺籍學生」，大家都知道這是臺獨的惡意栽誣，但是校方採信，各報刊登，甚至七號頻道的ABC全國電視網也在晚間新聞播出了。當時筆者、鍾蔚文、丁祖貽等七人聯合了三十多位中華民國留學生寫信向史丹福大學校長質疑此事。我個人還向各報紙、電視臺打電話和寫信抗議。其中 *Campus Report* 登出我投書的全文^②，華文「世界日報」則登出我

五、中國留學生的校園對抗

中共學生學人蜂湧來到西方世界後，對於我中華民國的留學生界自然造成了震撼。基於同是炎黃華胄的認識，初期我們留學生處處給予中共留學生呵護照顧，在衣食起居的適應、在語言課業的指導、甚至意外急難的幫助上，我們留學生無不顯示了同胞之愛。在民族感情的大前提下，暫時不談彼此政治立場的差距。

註② *Stonford University Campus Report* Oct. 6, 1982.

們奮鬥的經過²⁴。中共學生則在這事件中，利用臺灣資料大肆宣傳和醜化我們。

明尼蘇達大學的校園鬪爭則上昇至暴力。有位中華民國女留學生喜好批評政府措施而為中共學生所悉，就有一紅衛兵出身的中共學生脅迫其做情報工作，該女生心懼而拒絕，結果該中共學生行兇滅口，不料女生未死送醫院急救，警方逮捕兇嫌造成當地新聞。校方偏袒中共學生拒予作證，兇嫌無罪開釋後為中共使領館遣返。事後該女學生迅即嫁給一美國同學，並且無顏返臺，她的室友也因懼怕而於翌年轉學史丹福大學。

美國基於對中共有長遠的期望，美國各大學一如政治界人物在臺海兩峽的爭端中保持平衡甚至還有些偏袒。迄今有五十所美國學校和一百所中國大陸學校簽訂了雙邊協定²⁵。這個數目超過了美方與中華民國大學的雙邊交換安排。這對我方的不利在三個方面產生：

第一、美國各大學在審核外籍學生入學申請時偏袒中共，這將使中共學生急速成長而沒有名額限制。中共教育當局還頻頻向美國各大學，爭取免除托福和GRE考試，中華民國學生是從未享受到如此優渥待遇的。

第二、獎學金尤其東亞研究、法政科系偏袒中共學生，這將打擊依賴獎學金留美的我們清寒子弟的願望。近年來美國公私立大專院校一再調整學費，一些有名的如哈佛、耶魯、哥倫比亞、康乃爾、賓州大學等常春藤盟校都變得貴得出奇。許多我自費留學生為經濟負擔不得不改而申請中西部和南部學府。在獎學金減少的趨勢下，我們留學生人數雖未停止成長，却退出了許多好大學改而就讀較便宜的次等學府了。

第三、校方介入海峽兩岸留學生團體的校園鬪爭。史丹福大學中國同學會被迫開放，吸受中共學生，凡以「中國」為名的我旅美同學會團體，都不得拒絕中共同學參加，時間久了可能由量變到質變，使一些中共學生較多的美國大學的「中國同學會」落入中共的掌握。

敵我大規模的校園鬪爭尚未開始，「掛旗事件」只是前奏而已，如果有一天各校「中國同學會」發出響應「三通」、「四流」、「九點」的統戰通電，那就嚴重了。

目前我方留學生雖然兩倍於中共留學生，可是哈佛、耶魯、柏克萊加大等名校則是中共留學人員超過我方，幸好中共留學人員中六成以上是訪問學者，有學籍的研究生、大學生甚少，否則這幾個常春藤盟校就首先「淪陷」了。

香港留美學生人數不少，他們不喜歡談政治，但一談政治寧願得罪我們而不願得罪中共。一個「開放」的「中國同學會」是

註²⁴ 紐約《世界日報》，一九八二年十月十九日。

註²⁵ 同註²⁴。

「我」、「敵」、「港」兼容並蓄，港生是三角中最弱的一環。他們偏向中共，在同學會中投票就不利於我。在史丹福大學，我們留學生要進行愛國活動，曾因港生任史大中國同學會副會長就無法以該會名義來進行，只好假手純粹臺生組成的史大中國文化協會來發起。

海外留學生界的校園鬭爭是遲早難免的，應變之道是在我尚掌握優勢的時候，註冊更名，廢棄舊有簡單的“Chinese Student Association”“Chinese Student Service”等等，一律以正式的「中華民國」取代「中國」的名稱，排除中共學生、港生混進我們留學生組織，藉以避免有朝一日他們人多勢眾掌握了組織領導權，並進而以團體名義作出不利於我的統戰陰謀。

胡耀邦與中共政局

本書由本中心研究員方雪純著作，郭華倫教授校訂，有系統地介紹胡耀邦的背景資料，包括其學經歷、思想、才能、性格及事功等，藉以剖析胡某在中共政壇崛起的原因，以及今後對中共政局的影響，取材充實，論述精闢，為研究中共首腦人物難得之著作。全書二十四開一五〇頁，每冊實售新臺幣壹佰元，美金叁元，國內每冊另加郵掛費新臺幣十二元，國外每冊另加平寄郵資美金二元五角航空郵資美金五元。（請勿使用國研中心郵撥帳號）

郵購處：臺北縣中和市仁愛街三十號之三號方雪純

Mr. H. H. Fang 30-3 Jen-ai St. Chung-Ho
Taipei Taiwan, R. O. C.